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

李曙光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当代中国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名片,建构、翻译与传播具有丰富内涵以及高理解度的核心价值话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理论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是其跨语际实践的三个有机步骤,三者之间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但并非构成简单的线性序列。包括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播需要将翻译视为利用另一种语言对源语概念进行跨语阐释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有助于我们跨越汉语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我们的源话语,从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建构。此外,还需要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整源话语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建构、翻译以及传播构成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闭环。这种动态的跨语际话语实践观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以期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跨语言转换;跨语际实践;软实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软实力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王永贵、刘泰来,2015)。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中外优秀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提出了包括“中国梦”“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努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为中国软实力提升提供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努力方向。面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意识的觉醒及其产生的影响,一向重视软实力建设的部分美国政客担心中国的崛起对其现有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因此,除了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之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机会歪曲诋毁中国提出的核心发展理念。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这种复杂局面,我们更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在对受众的不同反应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就我国核心价值话语跨语际实践的策略与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从而进一步做好我国核心价值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为全球化进入平台期的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更好地贡献中国智慧(杨雪冬,2020)。

---

李曙光,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建构与翻译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主旨思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三个倡导”的形式首次得到系统而明确的表述。随后,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明确规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这三个不同维度分别对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做出了高度概括的规定(韩震,2017,第1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国际传播对于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在这个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化软实力灵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则是国外政要、媒体、智库研究中国执政理念以及发展目标的第一手资料(黄友义、黄长奇、丁洁,2014)。

在十八大报告的英译本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包含的24个字被视为12组概念并分别表述为: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prosperity(富强)、democracy(民主)、civility(文明)、harmony(和谐);freedom(自由)、equality(平等)、justice(公正)、rule of law(法治);patriotism(爱国)、dedication(敬业)、integrity(诚信)、friendship(友善)。对于这12组概念的跨语表述,理论界与翻译界基本上都比较认同,除了“友善”在有些文献中被翻译为goodwill之外,基本没有出现与之竞争的版本。然而,作为总体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术语除了上述十八大报告中提供的版本外,还存在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以及the core values of(Chinese)socialism等另外两个版本的英文表述。由于十八大报告英译本提出的表述后来被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中央权威文献的英译本继续采用,所以确立了其最高的权威性,从而在国内外广为传播。然而,另外两种表述也常常见诸各类文本之中,甚至有些从事对外宣传的专业机构将这三种不同的英语表述当作同义词不加区分地进行运用。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2019年10月31日在介绍有关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访谈节目时,同一篇文章里面出现了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与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这两种不同的表述<sup>①</sup>。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与中国翻译研究院2016年编辑出版的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当代中国关键话语的《中国关键词》一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表述为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第15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表述为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第17页)。由于上述版本都出自从事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权威官方机构,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当代中国标志性话语的上述三种不同英文表述都被作为官方认可的版本,一同收录在中国翻译研究院建立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sup>②</sup>。

一般认为,术语是特定领域专门知识的语言表达,是人类知识积累、交流与传播等实践活动的关键凭依,可以说“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冯志伟,2020,第2页)。因此,不同于日常语言,术语应该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严谨性以及稳定性,其译名的准确与统一对其所表征的理论概念的理解、接受与传播至关重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权威性与统一性在中央文献的外宣翻译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

<sup>①</sup>文章来源:<https://news.cgtn.com/news/2019-10-31/How-to-present-China-s-core-socialist-values-to-the-global-community-1eL7qWCgPS/index.html>,2020-06-27.

<sup>②</sup>术语库网址为:<http://210.72.20.108/index/index.jsp>,2020-06-27.

这决定着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否能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认同,是否能够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黄友义、黄长奇、丁洁,2014)。也正因如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与中国翻译研究院这两个对外出版与宣传的权威机构才顺应时代需要,主持建设了首个国家级多语种专业术语库,用以规范指导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工作(魏向清、杨平,2019)。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跨语言转换

如果把翻译视为“始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以忠实对等为目的的跨语言转换,从语言系统的本质来看,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Robins,2000,pp. 31—33),因为人类语言是一个精密的价值系统,构成该系统的每个单位都是在彼此的对立中确定了各自的价值(意义)。例如,法语的 mouton(羊,羊肉)虽然可以在指“羊”这一动物时跟英语的 sheep 对应,但这两个词却具有不同的价值,因为在法语中它还可以指一块烧好的羊肉,这时候英语就需要直接利用来自法语的这个借词(mouton)进行交流了:“英语的 sheep 和法语的 mouton 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 sheep 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而法语的词却不是这样。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相互限制着的。同义词如法语的 redouter‘恐惧’,craindre‘畏惧’,avoir peur‘害怕’,只是由于它们的对立才各有自己的价值”(索绪尔,2002,第161—162页)。正是在不同维度上的对立关系,语言才允许存在大量的近义词,这些词语尽管具有相同的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但在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情感意义(emotive)、反映意义(reflective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等联想性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s)以及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方面存在某种差异(利奇,1987,第13—33页)。

上述词语以概念意义为基础的多向度赋值这一特性给翻译带来巨大的挑战,是当下我们从事中国特色话语的跨语言转换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例如,我们目前作为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的“普通话”这个关键术语,在英语里面分别有 Mandarin(Chinese),Modern Chinese,Standard Chinese 等不同的表述,其中以 Mandarin Chinese 使用频率最高。然而,根据许文胜、方硕瑜(2019)的研究,Mandarin 源自梵语,在印地语、马来语和葡语的构词影响下,于16世纪被西方来华传教士用以指代清朝政府的官员,17世纪通过转喻引申又被用来指满清官员使用的官话。也就是说,即便我们通过约定俗成让 Mandarin 或者 Mandarin Chinese 在概念上作为“普通话”的等值语言符号进行跨语言转换,但是这个词在英语中“容易让人产生刻板、落后的语义联想,不利于当下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作为跨语言转换活动的翻译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不仅仅因为上述表达特定概念的词语因在各自所属的语言系统中具有不同价值而很难在意义上完全对等,还因为不同语言的语法规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英汉语名词中心词与其修饰语以及限定词组合构成复杂名词词组时,在遵循人类认知上的一些普遍原则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明显的不同。例如:(1)(在)教堂旁边的桥;(2) a bridge nearby the church。汉语和英语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目标客体“桥/bridge”来作为名词短语的中心词(head),以作为参照物的客体“教堂/church”来作为修饰语,但在线性组合顺序上则刚好相反,汉语采用的语序是修饰语在中心词的前面,而英语则是修饰语在中心词的后面(赵世开,1999,第41页)。当然,英语名词词组的修饰语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的前面。这就是说,英语名词中心词的修饰语既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而汉语无论修饰语多复杂则只能前置,因此,汉语中诸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带有复杂多重前置修饰语的名词词组比较常见。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复杂名词词组,其中心词是“价值观”,受“社会主义”与“核心”两个词语的前置修饰,而上述三种英文表述:(1) the socialist core val-

ues;(2)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3)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相互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词语组合顺序上。很明显,不考虑前面的限定词 the,第一种表述在词序上与汉语原文完全一致:都是将 socialist(社会主义的)与 core(核心的)作为中心词 values(价值观)的前置修饰语,并且将 socialist 放在 core 的前面,让 core 对 values 进行第一层修饰之后,socialist 再对 core values 这个组合结构进行第二层修饰,即按照以下这种方式进行组合:[socialist/社会主义[core/核心[values/价值观]]]。与汉语原文相比,第二种表述虽然也采用的是前置修饰,但两个修饰语的顺序刚好跟原文相反,即按照以下这种方式进行组合:[core/核心[socialist/社会主义[values/价值观]]]。第三种表述则将 core 作为前置修饰语,而将介词词组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作为名词中心词的后置修饰语,即以下面这种方式进行组合:[core/核心[values/价值观]][of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

仔细比较这三种组合方式,第一种最好理解,因为它与汉语原文完全一致。第三种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较之汉语只能采取前置修饰,英语名词修饰语还可以后置,因此在将汉语复杂名词词组翻译成英语时,将一部分修饰语处理为前置而将另一部分处理为后置是比较常见的实践操作。例如,上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复杂名词词组在英语中就可以表述为: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即将 great(强)、modern(现代化的)、socialist(社会主义的)作为前置修饰语,而将 prosperous(富的)、strong(强大的)、democratic(民主的)、culturally advanced(文明的)、harmonious(和谐的)以及 beautiful(美丽的)并列起来作为一个形容词词组,并将其作为一个关系分句的主语补语(表语)来构成以 country(国家)为中心词的名词词组的后置修饰语。如此一来,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上述最为通行的第二种“权威”表述方式中,为什么英语译文要将汉语原文的两个前置修饰语调换顺序呢?难道当中心词前面有多个修饰语时,英汉两种语言需要采取不同的语序吗?或者说名词词组的多重前置修饰语在两种语言中可以自由排列吗?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英语名词词组多重前置修饰语的语序问题。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的英语语法著作——《英语语法大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名词词组的多重前置修饰语划分为4个区域,在书面模式中从左至右分别为:前中心区域(precentral zone)、中心区域(central zone)、后中心区域(postcentral zone)以及名词中心词前区域(prehead zone)。能够出现在“中心区域”的修饰语一般由典型的等级性形容词充当。在该区域,如果有多个这一类别的形容词共同出现时,一般遵循的语序为:主观性形容词出现在客观性形容词之前,表示大小、长短和高低的形容词通常位于其他派生形容词之前,如 a beautiful small round table(一个漂亮的小圆桌子),此处三个形容词共同出现在中心区域,由于 beautiful(漂亮的)属于主观评价性形容词,所以出现在该区域的最左边,然后是表示大小(small)以及形状(round)的形容词修饰语。如上所述,出现在中心区域修饰语之前的位置被称为“前中心区域”,能够出现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修饰语:(1)表示强调或增强语气的形容词,如 pure(纯粹的);(2)弱化语气的形容词,如 slight(微不足道的)。排在上述“中心区域”之后的位置被称为“后中心区域”,出现在这个区域的修饰语主要为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以及表示颜色的形容词。排在最右边(即离名词中心词最近)的位置被称为“名词中心词前区域”,能够在这个位置出现的修饰语包括:(1)以表示国家、民族、起源和风格的专有名词为词根的形容词,如 Chinese(中国的,中国人的)、socialist(社会主义的)等;(2)其他由名词派生而来的形容词,这些词语常常有 consisting of(由……构成)、involving(涉及,包括)或 relating to(与……有关)等意义,如 annual(年度的)、medical(医学的,医疗的)等;(3)名词,如 tourist attraction(旅游景点)中的 tourist(游客),college student(大学生)中的 college(大学)等。英语名词前置修饰语一般的解读规则为,离名词中心词越近的修饰语,表达的是越本质、内在、稳定的属性。例如,the two typical large country houses

(两所典型的乡间大别墅),在理解这个名词词组的时候,人们解读信息时一般首先确定这两所别墅座落在乡下,然后为这两所乡间别墅很大,最后才会解读到这两所大别墅是很典型的乡间大别墅;也就是说,“country/乡间”相对于“large/大”是更为本质、内在的属性,而后者较之“typical/典型”这个属性则又相对更加内在、本质(Quirk, et al., 1985, pp. 1338—1341)。

与英语类似,汉语名词词组多重修饰语的顺序也不是自由的,根据陆丙甫(2010,第245—247页)的研究,汉语名词词组多重修饰语的语序大致有以下限制。(1)由大到小。越是能使名词中心词外延缩小的修饰语越是靠后(即离中心词越近)。如“袖珍化学词典”,因为“袖珍”仅相对于“非袖珍”而言,而“化学”却相对于“物理”“生物”“建筑”“数学”等学科而言,可见“化学词典”比“袖珍词典”更为专门(即体现了更为本质的属性),其外延更小,所以“化学”应置于“袖珍”之后,说成“袖珍化学词典”。(2)从临时到稳定。越是表述事物稳定性状的修饰语越靠后,如“新瓦房”,因为瓦房总是瓦房,而新的却会变成旧的,所以“新”应置于“瓦”前面。如果将上述两点结合起来,汉语名词词组修饰语的顺序通常遵循“大小、新旧、形状>颜色>质料和功能”这样的顺序,这显然与英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在外延上由大到小的顺序,是英汉语共同遵守的规律,从而表现为表达越本质、越稳定属性的修饰语越靠近名词中心词,认知语言学认为这是由人类共同遵循的认知规律决定的,因此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张敏,1998,第222—260页)。

另外汉语的多重修饰语还经常受到韵律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音节的数目)。例如,“大白马”听起来非常自然,但是“大白色马”就很难接受,改成“白色大马”则又十分符合汉语的语感。虽然“白色大马”中的两个修饰语“白色”与“大”的组合顺序似乎违背了上述人类语言所体现的认知上的共性,即相对于“大小”而言,“颜色”是更为本质的属性,应该出现在表示大小的修饰语“大”的后面才是合法的结构,但事实上“大白色马”却不可接受,“白色大马”反而是非常自然的汉语表达。这里主要是因为韵律模式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白色·大马”在韵律上是分别由两个各自包含两个音节的单元构成的22节奏模式,说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而“大·白色·马”则是汉语中不常见的121节奏模式,因此,听起来不像地道的汉语,尽管其组合符合汉语名词词组多重修饰在语义以及语法上的组合规律。这就是说,汉语中词语组合在韵律上的要求有时候要压制语义与语法上的要求——为了符合节奏模式,说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宁可违背语法甚至语义规律(陆丙甫,2010,第246—247页)。

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听起来远比“新·社会主义农村”更加符合汉语的语感,尽管后者在语义以及语法上更加符合汉语的组合规律。由于英汉名词词组多重修饰语相互组合时在语义以及语法上遵循类似的规律,但在韵律模式上却有着各自的偏好,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表述为英语时就需要调换“社会主义”与“新”这两个修饰语的位置,表述为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述为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由是观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翻译成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应该是比上述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更为规范地道的英语表达,因为相对于“核心”,“社会主义”是更为本质的属性——“核心”只是相对于“非核心”(即对立项少,外延大),而“社会主义”则相对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不同的社会形态(即对立项相对较多,外延小)。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跨语际实践

以上分析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如果将“社会主义”与“核心”都看成是修饰限制中心词“价值观”的前置修饰语,按照汉语多重前置修饰语在语义与语法上的组合规律应该表述为“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汉语的节奏模式。由于英语与汉语韵律模式不尽相同,所以在做跨

语言转换时就应该还其本来面目,表述为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种翻译的好处在于,既符合英语在韵律上遵循的“尾重”(end weight)原则,又符合上述多重前置修饰语应遵循的语法、语义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说,相比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是更为地道的英语表达,这应该是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等中央发布的权威文献之所以采用后者的主要原因,因为翻译要照顾目的语读者的表述与阅读习惯,这是从事外宣翻译工作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陈明明,2014)。然而,这种翻译方法依赖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核心”与“社会主义”都是中心词“价值观”的前置修饰语,并且相对于“核心”,“社会主义”是“价值观”更为本质的属性。可以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话语以及概念分析,译者在翻译中央文献时一般是不可能做出如此大胆的词序调整的,因为忠实传达政治文献的言说意图,特别是领导人的讲话意图是政治文献翻译需要遵守的黄金原则(程镇球,2003)。在这种意义上,翻译的实质其实是在用目的语对源语话语进行一种特定的阐释,是一种“跨语际实践活动”(translingual practice)(刘禾,2008,第1页)。

相对于以翻译为主要形式的跨语阐释,语内阐释则是更为常见的话语实践形式。作为当代中国最为显性的主导话语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的建构、阐释与传播构成了我国最为活跃的话语实践活动。在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实践活动的不同社会主体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应该是理论工作者,他们通过课堂教学、主题讲座、政策咨询报告,特别是发表研究论文等形式参与这一话语实践活动,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理论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话语实践成果,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首席专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张景荣教授带领的团队于2017年8月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综述》一书,用以“记述自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盛况”(张景荣等,2017,第1页)。从该书提供的综述来看,国内理论界往往将“核心价值观”看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话语,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张景荣等,2017,第23页)。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表述的语义分析,我们利用“核心价值观”作为篇名,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至2020年6月27日,标题包含“核心价值观”的论文一共检索到688篇。这些论文中除有很少的一部分将“核心价值观”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徐蓉的《新中国70年来核心价值观建设及其演进的认知维度》,绝大多数都是将“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定型的术语在使用,例如:陈文旭、舒高磊的《当代美国媒体变革与核心价值观传播》,潘玉腾的《欧美国家推进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及启示》,樊永刚、曹大文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英国核心价值观比较》以及周名峰的《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典的经验及当代启示》等等。从论文标题以及文章的内容来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定的核心价值观,从而说明“核心价值观”在学术界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整体概念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实践。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当代中国关键词,国内从事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利用汉语进行阐释建构的时候,采取了不同于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中央文献的英译专家利用英语进行阐释时所采用的角度:前者将“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术语,而后者则将“核心”看成一个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更加外围的修饰语。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利用其它外语来对这个关键词进行翻译阐释的话语实践主体是不是也会采用类似于以上英语译者所采用的阐释视角呢?检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的法文以及德文翻译发现,官方提供的权威法文版本为 les valeurs essentielles socialistes,德语版本为 Die sozialistischen Grundwerte。仔细比较不难发现,法语虽然采取了后置修饰

方式,但其修饰语 *essentielles*(核心的)相对于修饰语 *socialistes*(社会主义的)离中心词 *valeurs*(价值观)更近,从而与汉语原文以及跟汉语原文比较对应的英文翻译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形成了镜像对称关系,说明法文译者同上述国内学者以及相对“非主流”的英文译者采用的是相同的阐释视角——将“核心价值观”看成一个整体的概念。德语则更是如此,因为从上面的译文可以看成,德语里的 *Grundwerte* 这个词语本身就是核心价值观的意思,其自身作为中心词接受 *sozialistischen*(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的前置修饰。可以说,德语将“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予以专门的造词,为将“核心价值观”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如果把上述语内以及跨语阐释看成一场讨论会,虽然没有人提出“核心”比“社会主义”是“价值观”更为本质的属性,但主张将“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看待或者说不赞同将“核心”作为一个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更加外围的修饰语看待的人明显占多数。尽管如此,由于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这个表述为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所采用,并且在英语世界流通也最为广泛,所以这一阐释角度代表的声音也不能忽视。两种相互不同的声音共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会让术语用户有点不知所措,但这是翻译作为跨语际实践而具有的常态。这种跨语际多声对话的意义在于,两种阐释视角的共存互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核心”“社会主义”以及“价值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是从事汉语内部话语建构、阐释以及传播活动的不同实践主体至今还未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核心价值观”看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而“社会主义”又是其本质属性的规定,那么表述为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则是无可厚非的,但遗憾的是英文不似德语有一个现成的词语来指称“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只能以“形容词+名词中心词”这种分析性方式来对其进行表征。然而,当 *socialist* 与 *core* 共同出现在名词中心词的前置修饰位置时,英语前置修饰语的组合规则要求将 *socialist* 放到“中心词前的区域”(prehead zone),因为这是表示国籍、来源与风格等属性的修饰语所应出现的典型位置(Quirk, et al., 1985, p. 1339);另外,“社会主义”的确也是我们所应该培育与践行的 24 字价值观的本质性规定(张景荣等, 2017, 第 27 页)。

为了避免上述源语概念与目的语表述因语言系统差异而造成的冲突,我们认为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这一表述应该是值得推荐使用的英译版本。在这个版本的表述中,中心词 *values* 同时受到前置的 *core* 以及后置的 *of (Chinese) socialism* 的修饰限制,从而以地道的英语形式对这个中国特色关键话语进行了传译,既在结构形式上保证了“核心价值观”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又保证了该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比阐释会引发以下思考:该价值观之所以是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其价值观必然具有普遍性,因此是人类社会都应该能够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另外,上述表述在语言结构上还可以顺利扩展为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就可以用更加明确的形式突出该价值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成果,从而彰显了中国特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三种不同表述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阐释方式,它们与汉语内部的概念话语分析以及理论阐释一起丰富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翻译的看法,不再将其仅仅视为利用另外一种语言忠实表述源话语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不再认为二者之间只是构成一种单向的线性传递关系。事实上,翻译阐释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是国际视野中话语建构的一个必要部分,源话语与译文之间不是单向的线性传递关系,而是要不断从跨语言阐释与传播中获得必要的回馈,以便进入新一轮的丰富与发展。因此,国际视野中构成完整话语实践的三个步骤——建构、翻译、传播——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闭环。

翻译阐释与传播接受推动中国特色话语进入新一轮建构的另外一个重要例证来自“一带一路”话语的跨语际实践。“一带一路”话语刚开始形成时,中文表述为“‘一带一路’战略”,因此英文将其中的“战略”对应表述为 strategy,然而这种表述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不太乐观,遭到了不小的误解,甚至有人将其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袁赛男,2015),经过调研发现原来外国人对于 strategy 的理解与中国人对于“战略”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后来“经过各方几年的努力,现在官方文件不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是用‘一带一路建设’或者‘一带一路倡议’这两种方式”(朱义华,2019,第118—119页)。

## 四、余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在复杂国际形势中更好表述自我,在观念政治领域展现真实自我形象的主要路径,其本质上属于跨语际话语实践活动。跨语际实践通常由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三个重要步骤构成,其中翻译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为话语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压力。

将翻译看成完整而动态的跨语际话语实践的关键一环,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让我们深切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间的相互转换,而且更应该看成是用目标语来对源话语进行理解、阐释与建构的跨语际实践;翻译的过程不是译者试图利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表达原作意图的单向线性传递过程,而是原作者、源话语阐释者、译者、传播者等众多话语实践主体的对话共建过程。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提高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效果的一个关键路径在于尽快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用以协调话语建构方、翻译方、发布机构等不同话语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目前我们面临的各项挑战,才能更好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参考文献:

- 陈明明,2014:《在党政文件翻译中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翻译》第3期。
- 程镇球,2003:《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中国翻译》第3期。
- 冯志伟,2020:《序言》,魏向清、刘润泽、时闻编:《术语·知识·话语——跨学科视域下的术语翻译研究新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韩震,20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黄友义、黄长奇、丁洁,2014:《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翻译》第3期。
- [英]利奇,1987:《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刘禾,2008:《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本),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 陆丙甫,2010:《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瑞士]索绪尔,2002:《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永贵、刘泰来,2015:《打造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 魏向清、杨平,2019:《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与术语翻译标准化》,《中国翻译》第1期。
- 许文胜、方硕瑜,2019:《国际语境下的术语翻译与中国形象建构——基于语料库的“普通话”概念词使用实证研究》,《中国外语》第2期。
- 杨雪冬,2020:《全球价值理念的生成机制初探》,《东北亚论坛》第4期。



- 袁赛男,2015:《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新对外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第6期。
-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景荣等编,20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综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赵世开编,1999:《汉英对比语法论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翻译研究院,2016:《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第一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朱义华,2019:《外宣翻译的新时代、新话语与新思路——黄友义先生访谈录》,《中国翻译》第1期。
-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 Robins, R. H., 2000, *General Linguistics* (4<sup>th</sup> ed.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责任编辑:程天君)

## Discourse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Its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 Shuguang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is the soul of China's cultural and soft power and thus constitutes a cultural identity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build social consensus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re value discourse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high degree of understandability is the focus of China's cultural and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oretical discourse are the three indispensable steps of its translingual practice. Although the three steps are sequential in time, they do not constitute a simple linear sequence.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includ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requires us to regard translation as a key link in the translingual practice of discourse by using another language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is interpretation can help us revisit the source language discourse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us constituting another form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discourse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target readers. In this way, the three steps of th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form a dynamic and spiraling closed loop. This dynamic view of translingual discourse practice can help us obtain a more macro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our country's discourse intended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 hoping to offer meaning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ultural and soft power in the current turbul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words:** discourse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translingual shift; translingual practice; soft power development

**About the author:** LI Shuguang, PhD in Linguistics,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